

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部门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考虑的实际上是0维空间问题,但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却要在“时间-空间”及其交互作用的二维层面上展开问题的研究。伴随着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的区域经济研究逐步走向成熟。这不仅体现在所使用分析工具、分析方法更突出的计量化和模型化,而且也充分地反映在区域经济研究所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也更趋于多样化、完备化。在我国范围实现不同区域间所谓的协调,其着重点:一是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设计;二是中国区域文化的整合并制定出与不同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66(2009)01-00043-04

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考虑的实际上是0维空间问题,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的资源配置仅仅是一个具体时间点、具体时间段上的配置问题;但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却要在“时间-空间”及其交互作用的二维层面上展开问题的研究。^①因此,如果说经济学解决的是经济变量在时间变动中“两难困境”折衷问题的话,那么区域经济学就是要在空间和时间的复合系统中处理经济变量的“两难”折衷。本文通过对西方区域经济思想和理论演变轨迹的探讨,着重剖析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问题及其阶段性特征,并就区域经济研究本土化问题提出了笔者的基本看法。

一、西方区域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发展

目前,一些经济学家仍在努力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把空间因素引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从区域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古典区位论

古典区位论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由杜能(Tunen, 1826)创立的区位理论。他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 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 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随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 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分析基本上是将区域作为一种成本因素打入了经济活动的分析之中。比如,农业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并且,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但古典区位论将区位选择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后,区位选择就成为了区域经济学的重要主题之一。^②

(二)现代区位论

二战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现代区位论对各种空间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表述越来越公理化、量化和规范化。与古典区位论不同,现代区位论不仅强调企业区位决策,也特别强调企业家和家庭区位决策;不仅关注运输成本最小化问题,也开始关注利润最大化等的综合性目标。具体而言,从其研究的范围来看,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从其研究的目标来讲,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值得强调的是,在现代区位论快速发展的时期里,人们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到了区域发展的均衡性与否的

[收稿日期]2008-06-10

[作者简介]胡晓鹏(1975—),男,山东济南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问题上,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理论。

1.区域均衡增长论。利用索罗—斯旺增长模型,认为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也提出了区域收入水平随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与人们经验判断不相吻合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为了对这一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缪尔达尔(Myrdal, 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赫希曼(Hirschman, 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而极化效应起着支配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了补充。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则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俄林还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而言之,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三)新经济区域理论

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理论不同,新经济区域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如技术的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了企业区位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新经济区域理论主要在以下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1.新经济区位理论突破了传统区位理论分析的框架。一方面,它把从注重工业区位的区位理论分析延伸到了也关注办公区位(Office Location)、零售区位(Retail Location)等的区位理论分析;同时给出了决定这些区位选择的因素。另一方面,通过模型(克鲁格曼, 1991)的方式证明出: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

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此外,新经济区位分析将马歇尔的关于某一特定产业(信息产业)的外部性经济扩展到了一般性的外部经济。而这里的外部经济概念则是与需求及供给关系相联系的,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效应。

2.运用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或发散问题进行了解释。一是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从而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结果必将是区域间马太效应的增强。二是俱乐部趋同。根据巴罗等人的研究发现,即使区域间存在着一定的趋同,这种趋同性也是很难观测到的,同时这些趋同的现象也要有很强的条件约束,如区域间具有同质性或相同的经济稳定状态等。因此人们通常将这种趋同称为“俱乐部趋同”。三是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由于规模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正向的内生性作用,最终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虽然从理论上讲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应越快,但是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将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

综上所述,如果说在早期的区域经济分析中是将区域以成本的形式加入到了分析模型或框架之中的话,在后期区域经济学则把重点放在了地理空间内在本质以及复杂空间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方面。这一点,可以在空间选择行为的离散选择模型以及创新和空间动态的演化理论中寻找出这种努力的绩效。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现状

(一)关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下经济发展的弊端日益暴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表现为产业均衡布局所导致的资源低效利用,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围绕区域生产力均衡布局的讨论成为了当时的热点问题。我国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国情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后,对区域生产力布局提出了“均衡配置”论、“梯度推移”论、“点轴开发”论和“反梯度”的跳跃发展论等。在布局展开的方式上,有的主张均衡布局、平衡发展;有的主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梯度推移;有的主张实行点轴开发,由点到面的扩散;有的主张中部突破,带动两翼;有的主张落后地区要跨越阶段,跳跃发展。应当说,这些理论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一些偏颇之处。

均衡配置论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出发,认为生产力布局要均衡展开,尽快消除地区差别。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符合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观点,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根本没有物力、才力的支持,把布局搞散,只能导致社会宏观效益下降,欲速则不达。梯度推移论从我国空间上客观存在的东中西地缘格局出发,以实现我国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指出应当把资源集中放在经济技术比较发达的高梯度地区,随后在向低梯度地区扩散。^[1]这一理论

尊重中国的客观实际,有重点、分阶段的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是有道理的。但有人认为按照这一做法进行生产力布局,最终很可能使中国的区域差距过分地拉大。反梯度理论则从中国各级梯度地区具有的资源优势的角度论证了低梯度地区也具有跨越发展的可能。^[2]而点轴开发理论认为,所有产业特别是工业、交通运输业、第三产业都是产生和集中于“点”上,并由线状交通运输设施联系起来。因此,在地区布局上,应通过点轴式的开发,使产业实现点——线——面的扩散和空间转移,使各地区的国土资源得到充分的相对均衡的开发利用。这种主张对于重点建设区位的选择是可行的,但没有阐明地区间不同的建设重点。

总之,在上世纪8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围绕着生产力布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从中国区域实际所走的道路来看,我们基本是采用了梯度转移论的思路。这一点,从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观能够清楚地认识到。

(二)关于区域差距问题的讨论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一段时期,区域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区域差距问题展开的。1989年杨开忠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3]^(P33)他指出,新中国成立40年来,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水平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并且,随着人口和国民收入区域间增长趋势的叠加,致使我国以人均国民收入所表示的区域经济差异呈U型变化的趋势。1992年青年学者蒋岳、刘垠等人利用计量工具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研究。^[4]^(P121)在对各省区经济实力全面评价的基础上,全面展示了中国各省经济势力和发展潜力的差异。尤其是,1995年胡鞍钢等发表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更是将人们对区域差距问题的关注引向了顶峰。不仅引起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也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该书中,胡鞍钢尖锐地指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地区差距的思路,不是“压高就低”、“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P68)此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

首先,青年学者魏后凯和他的同事们用“失衡的中国区域”概括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问题。继而探讨了“建立区域经济新格局”的途径,全面探讨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带、地区与省际间的差异以及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其次,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地区差距分析》一文中系统地对我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按基尼系数的方法测算了我国的地带及地带间差异对区域差异的贡献。他指出:“1995年由东、中、西之间的差异造成的贡献率为51.72%,由东部内部造成的贡献率为22.86%,由中部内部造成的贡献率占12.53%;由西部内部造成的

贡献率为12.88%。”^[6]再次,蔡昉等人在对中国区域差距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工具从制度、人文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特征。他指出:“在中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经济增长条件的异质性表现得相当突出,使得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大相径庭的经济稳态。这种稳态的差异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制度或体制对市场机制的贴金程度所导致。”^[7]^(P109-111)最后,从中国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Sylvie Demurger等人将区位因素和政策因素系统引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模式中,指出:“省际收入差距变动的条件收敛较弱,这反映在现行体制通过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的限制和对Stolper-Samuelson机制^[3]的限制,阻碍了省际收入差距的收敛过程。”同时他还认为:“假如政策类似,中部省份在1996~1999年期间应该增长最快(8.7~9%),而沿海省份应比东北、西北、西南的省份都有更快的增长。此外,由于优惠政策对内地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取消优惠政策使各省在政策上平等将会对内地省份带来负面冲击。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优惠政策有无效果,而在于优惠政策享受机会均等。因此,解决的办法并非取消优惠政策,而是扩大内地省份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8]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差距究竟是合理的、是提高效率的正常反映,抑或不合理的并已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区域差距是存在着趋同还是存在着趋异;以及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缓解区域差距的政策等。在方法论上也逐步地从传统的定性分析为主向计量分析、模型分析演变。

(三)关于区域经济结构的探讨

伴随着中国区域差距的拉大,经济运行本身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过剩经济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工作更是对结构性的失衡现象倍加关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所说,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和转变。与此相应,许多专家学者逐步将经济学关于结构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了区域研究之中,并对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现象进行研究。其实,关于区域经济结构问题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不仅区域生产力布局问题是空间经济结构的一种表现,而且在80~90年代期间,当人们热衷于区域差距问题的研究时,区域经济结构的问题也一直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有机地融入分析框架之中。总的来讲,关于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对区域产业结构的研究。自从钱纳里提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变化应能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9]^(P22)的观点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提出和证明经济结构(主要是指产业结构)随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变动,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经过库兹涅茨、钱纳里等著名经济学家们的杰出的工作,已经

被各国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

从我国的实际研究状况来看,对于区域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上。就这方面而言,集中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和深入探讨了中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等。就所用方法来看,有的运用产业关联,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进行研究(钟学义、王丽,1997);有的根据中国产业结构的层次性差异,通过分类、分层进行研究(陆大道、薛凤旋,1997);还有的则通过“标准的结构转换”为参照物来归纳其基本特征,从而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模式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周振华,1992)。从根本上来讲,这些学者对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是从国家宏观层面上展开的,但由此所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也基本适合区域层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系列关于区域产业结构研究的专著出现,开始从不同侧面深入探讨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和特征。

2.关于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空间结构是区域发展状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区域发展状态是否健康,与外部关系及内部各部分的组织是否有序、萌芽而有活力的因素是否被置于有利的空间区位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产业发展与规划当中的空间集中与分散的问题;二是正确处理和对待沿海与内地、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关系,核心在于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三是城镇合理规模和城镇体系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省区的案例研究中;四是中国空间发展战略问题,一定意义上讲,这一部分的研究是区域经济研究中关于生产力空间布局问题的进一步延伸。限于篇幅,笔者不再详述。

三、评论与展望

伴随着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的区域经济研究也逐步走向成熟。这不仅体现在所使用分析工具、分析方法更突出了量化和模型化,而且也充分地反映在区域经济研究所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也更趋于多样化、完备化。由于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因此以西方纯粹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理论也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本土化的过程依旧是中国学者所努力的方向。此外,笔者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协调的问题,而要真正在一国范围内的不同区域间实现所谓的协调,却并非易事。因为协调本身就要求打破一种利益格局同时形成新的利益格局,但任何利益格局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制度根源、社会根源。而这一点绝非通过复杂的模型就能够完全解决的。

中国成功地加入世贸组织无疑给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和实现协调发展带来了契机。这是因为,入世后中国就必须真正地做到与世界接轨。此时,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就成为了一个市场,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必

将全面地渗透到中国区域经济的运行之中。任何非理性的个人行为、非规范的操作都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对中国经济区域研究过程中,以下两个方面也应被作为重点加以探讨。一是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设计。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但也并非无可作为。比如中央在对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上,过去一直是成文或不成文的以区域人均GDP的高低来衡量,显然这种标准是造成短期化行为的根源,并从根本上阻碍了区域的协调发展。在此,笔者认为,在绿色GDP尚未付诸实践之前,可以考虑采用“区域内最低人均GDP”的评价指标。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最低的人均水平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即使政府集中发展原来人均水平最低的地区,但很可能造成最低人均水平的地区不再是最低的局面,从而使其短期化的行为没有了具体的针对目标。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区域政府的长期化行为成为主导,实现区际经济协调发展。二是中国区域文化的整合并制定出与不同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说到底文化背景是支配人类行为的中枢。中国地域辽阔,文化的区际差异较大,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市场运行的效率、运行的机制不尽相同,如何充分地利用文化差异、协调文化差异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或许是我们多年忽视的一个大课题。

[参考文献]

- [1]周起业.梯度理论是怎么回事[J].地区发展战略研究,1987,(2).
- [2]郭凡生.何为反梯度理论[J].开发研究,1986,(3).
- [3]杨开忠.中国区域发展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
- [4]蒋岳、刘垠.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比较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 [5]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 [6]林毅夫.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
- [7]蔡昉等.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8]Sylvie Demurger等.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J].经济研究,2002,(9).
- [9]霍利斯·B.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注释]

- ①在《空间经济学》(Krugman,2000)一书中克鲁格曼则把空间观念引入了经济学,将0维分析变成了二维分析。
- ②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 ③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论证了全球化条件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必然性。但世界各国全球化的实践却表明,这并非一条“经济法则”,而且完全奠定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全球化也将面临世界性“反全球化”运动的挑战。

[责任编辑:林 澍]